

姚際恆與顧頡剛

林 慶 彰*

關鍵詞：姚際恆 顧頡剛 詩經學 辨僞學

一、前 言

姚際恆（1647-？）是清初的經學家，也是最有疑古精神的學者，他著有《古今僞書考》、《九經通論》等書。由於他的治學學風與清乾隆時代的學風並不相合，所以《四庫全書》中並沒有著錄他的著作。他的事蹟逐漸湮沒不彰。《九經通論》也亡佚大半。顧頡剛（1893-1980）是民國的經學家、古史研究者，他所主編的《古史辨》，掀起近代考辨古史的新風潮，而形成所謂「古史辨學派」。

他們兩人相隔兩百餘年，何以要合在一起討論？就顧頡剛的治學經歷來說，影響他最大的三位古人是鄭樵（1102-1160）、姚際恆和崔述（1740-1816），三人都啓導了顧頡剛的疑古精神^①。其中，姚際恆的《古今僞書

* 本所研究員。

① 顧頡剛曾說：「我的《古史辨》的指導思想，從遠的來說，就是起源於鄭（樵）、姚（際恆）、崔（述）三人的思想。從近的來說，則是受了胡適、錢玄同二人的啓發和幫助。」見顧氏著：〈我是怎樣編寫《古史辨》的？〉，收入《文史哲學者治學談》（長沙：嶽麓書社，1983年1月），頁82-112。

考》，更影響顧氏一生治學的命運。要了解顧頡剛的學術淵源，就應探究此三人與顧氏間的關係。就鄭樵與顧頡剛來說，筆者已作有〈鄭樵與顧頡剛〉一文^②。就崔述與顧氏的關係，相關的論文已有數篇^③。獨姚際恆與顧氏的學術淵源關係，尙未有學者作較深入的討論。筆者計畫完成一部《顧頡剛的學術淵源》的專著。這篇論文算是該專著中的一章。

要討論姚際恆與顧頡剛的關係，應從姚氏事蹟的湮沒不彰談起。其次，爲要彰顯姚氏的學術，顧氏開始蒐集整理姚氏的著作，在整理之餘，顧氏對姚氏的《古今僞書考》、《詩經通論》也有相當深入的研究。本文各節將對顧氏的研究略加分析。最後，則敘述姚際恆之學對顧氏的影響。希望藉這篇小文能看出顧氏表彰姚氏之學的苦心，及其與姚氏的學術淵源關係。

二、姚際恆的事蹟湮沒不彰

當今研究傳統學術的人，大都知道姚際恆的大名，也知道他有《古今僞書考》、《九經通論》等書，但是在清代姚際恆過世後的二百年間，學界中知有姚際恆這人的，是少之又少。姚際恆的事蹟在清初即湮沒不彰。從清代人的著作中，所載姚氏事蹟都甚爲簡短，即可證明。

比較確切可靠的是，當時閻若璩和毛奇齡的記載。首先是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冬天，姚氏經由毛奇齡的引介，認識了閻若璩。閻若璩云：

癸酉冬，薄遊西泠，聞休寧姚際恆字立方，閉戶著書，攻僞《古文》。

蕭山毛大可告余：「此子之廖稱也，日望子來，不可不見之。」介以交

② 該文是1995年，筆者參加中國宋學會主辦的「宋學與東方文明國際研討會」發表的論文，刊於《泰安師專學報》1999年第2期。

③ 筆者所知者有：(1)路新生：〈崔述與顧頡剛〉，《孔孟學報》第64期（1992年9月），頁135-156。又發表於《歷史研究》1993年第4期（1993年8月），頁61-76。(2)邵東方：〈論胡適、顧頡剛的崔述研究〉，收入邵氏著：《崔述與中國學術史研究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4月），頁205-292。

余，少余十一歲。出示其書，凡十卷，亦有失有得，失與梅氏、郝氏同。得則多超人意見外，喜而手自繕寫，散各條下。^④

這是有關姚氏較早的記載。另外，閻氏《尚書古文疏證》中，錄有姚氏說法二十餘條。

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十一月底，毛奇齡設宴款待由北方來問學的李堪，姚氏應邀參加。席間，姚氏以所著《古文尚書通論》與《儀禮通論》，送請李堪指正^⑤。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）六月，毛奇齡寫信安慰李堪會試落榜，信中述及姚際恆辨《周禮》事。該信說：

近姚立方作《偽周禮論》，秘不示我，但觀其總論，乃紹述宋儒所論，以爲劉歆作。予少就其總論中所辨者辨之，名《周禮問》，恨其書未見，不能全辨，然亦見大槩矣。^⑥

在這之前，姚際恆完成了《周禮通論》，認爲《周禮》是劉歆僞作。毛奇齡看了總論以後，以爲有可反駁的地方，所以作了《周禮問》一書。

康熙四十一年（1702），辨《古文尚書》的學者聚會。毛奇齡的《經問》對此事有較詳細的記載：

淮安閻潛邱挾其攻《古文》書若干卷，名曰《疏證》，同關東金素公來，亦先宿姚立方家而後見過。但雜辨諸經疑義，並不及《古文》一字。次日，復過予，時金素公、沈昭嗣、倪魯玉、姚立方俱在座。偶及顧亭林《日知錄》論禮一條，謂天子諸侯絕期，惟恐以期喪廢祭事也。

④ 見閻若璩撰：《尚書古文疏證》（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公司，1979年《重編皇清經解續編》本），卷8，頁39。

⑤ 見馮辰撰：《清李恕谷先生年譜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8年3月），卷2，頁38。

⑥ 同前註，卷3，頁14。

予顧在座貽睟，謂古禮並無以期喪廢祭事之文，此是何說，遂罷。^⑦
 這次，他們的聚會，姚際恆雖在座，或許並沒有發表什麼意見，所以毛奇齡沒有特別提到他。

以上是姚氏事蹟中有年代可尋的。另外，毛奇齡《西河文集·詩話》中有一則毛奇齡之兄毛萬齡（大千）贊賞姚際恆博學的記載：

亡兄大千為仁和廣文，嘗曰：「仁和祇一學者，猶是新安人。」謂姚際恆也。予嘗作〈何氏存心堂藏書序〉，以示兄，兄曰：「何氏藏書有幾，不過如姚立方腹篋已耳。」立方，際恆字。及予歸田後，作《大學證文》，偶言小學是寫字之學，竝非〈少儀〉、《幼學》之謂，不知朱子何據，竟目為童學，且哀然造成一書，果是何說？立方應聲答：「朱所據者，《白虎通》也，然《白虎通》所記，正指字學，誠不知朱子何故襲此二字。」因略舉唐、宋後稱小學者數處，皆歷歷不謬，坐客相顧皆茫然，則度越時賢遠矣。第是時兄已死，予述兄語示立方，立方即贈予長律二十韻，中有云：「城隈山鳥白，亭下水花紅，李固追隨日，侯芭涕淚中，深懷因令弟，縈慕等蒙童。」其情詞篤實，始知亡兄非輕許人者。仁和學宮在城西之隈，宮右有荷池，池上有亭，名琢玉亭，為坐客談讌之所。「城隈」二句以此。^⑧

當時學者有關姚際恆的記載也僅上述數事而已。姚氏是什麼時候過世的，既沒有傳狀，也沒有墓誌銘。至今他的卒年仍是個謎。

到了乾隆年間，編《四庫全書》時，姚際恆的著作一本也沒有收錄，僅在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子部雜家類存目，收了姚氏《庸言錄》的提要：

⑦ 見毛奇齡撰：《經問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18，頁18。

⑧ 見毛奇齡撰：《西河文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8年《國學基本叢書》本），〈詩話〉，卷4。

《庸言錄》，無卷數，浙江吳玉墀家藏本。國朝姚際恆撰，際恆字善夫，徽州人。是編乃其隨筆筭記，或立標題，或不立標題，蓋猶草創未竟之本，際恆生於國朝初，多從諸耆宿游，故往往剽其緒論。其說經也，如闢圖書之偽，則本之黃宗羲；闢《古文尚書》之偽，則本之閻若璩；闢《周禮》之偽，則本之萬斯同；論小學之爲書數，則本之毛奇齡，而持論彌加恣肆。至祖歐陽修、趙汝楳之說，以《周易·十翼》爲偽書，則尤橫矣。其論學也，謂周、張、程、朱，皆出於禪，亦本同時顏元之論。至謂程、朱之學不息，孔、孟之道不著，則益悍矣。他如詆楊連、左光斗爲深文居功，則《三朝要典》之說也。謂曾銑爲無故放邊釁，則嚴嵩之說也。謂明世宗當考興獻，則張柱之說也，亦可謂好爲異論矣。^⑨

這提要對姚際恆的學術可說肆意誹謗。姚氏的學術是否全本於清初儒者，學者已多所論辨，此不贅^⑩。由於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偏見，能關心姚氏學術的可說相當少。在乾隆年間，有杭世駿作《續禮記集說》，其中採入姚氏《禮記通論》約二十餘萬字，對姚氏的成就頗爲肯定：

姚際恆，字立方，錢塘人。著《九經通論》，中有《禮記通論》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帖，立義精嚴，大都爲執《周禮》以解禮者，痛下鍼砭。^⑪

此外，另有佚名撰的《武林道古錄》，整理了一篇較爲完整的姚氏傳記。這是現有最早的姚氏傳記。茲鈔錄如下：

^⑨ 見紀昀等撰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9年），卷25，頁41-42。

^⑩ 見顧頡剛撰：〈校點古今偽書考序〉，收入林慶彰、蔣秋華編：《姚際恆研究論集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1996年6月），上册，頁257-271。另村山吉廣著，林慶彰譯：〈姚際恆的學問（中）——他的生涯和學風〉，收入上引書，頁39-64。也有考辨。

^⑪ 見杭世駿撰：《續禮記集說》（清光緒三十九年浙江書局刊本），卷首，姓氏，頁10。

姚際恆，字立方，號首源，仁和諸生。少折節讀書，泛濫百氏，既而盡棄詞章之學，專事於經。年五十，曰：「向平婚嫁畢而游五嶽，予婚嫁畢而注九經。」遂屏絕人事，閱十四年而書成，名曰《九經通論》。時山陽閻若璩力辨晚出《古文》之偽，際恆持論多不謀而合，若璩撰《古文尚書疏證》，屢引其說以自堅，而蕭山毛奇齡篤信《古文》，作《冤詞》，與若璩詰難。奇齡故善際恆，以際恆之同於若璩也，則又數與爭論，際恆守所見，迄不為下。奇齡嘗與客言：「小學者六書之學，朱子指為幼儀，不知何據？」際恆應聲曰：「朱子所據者《白虎通》也，第《白虎通》亦言字學，而朱子借用之。」因舉唐、宋後之稱小學者，源委井然。奇齡為嘆服。際恆又著《庸言錄》若干卷，雜論經史、理學、諸子，末附《古今偽書考》，持論雖過嚴，而足以破惑，學者稱之。

《武林道古錄》流傳並不廣，今未見。後來這篇傳記收入鄭澐修、邵晉涵等續纂的《（乾隆）杭州府志》^⑫，卷90，〈儒林傳〉中。這是乾隆間，有關姚氏事蹟較詳細的記載。

嘉慶以後，漸有學者刊刻姚氏的著作，首先是嘉慶年間鮑廷博將姚氏《古今偽書考》，刻入所編《知不足齋叢書》中。這《古今偽書考》在光緒年間，則有七種刊本^⑬。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學術風氣的轉變。其次是嘉慶四年（1799）顧棻薇輯刻的《讀畫齋叢書》，收有姚氏的《好古堂家藏書畫記》二卷、《續收書畫奇物記》一卷。三是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王篤鐵琴山館刊刻《詩經通論》。後來，在同治六年（1867）成都書局又將王篤刊本重刊。直至清朝結束，姚氏的著作有刊本的，也僅有《古今偽書考》、《好古堂家藏書畫記》、《續收書畫奇物記》、《詩經通論》等四書而已。

^⑫ 有清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刊本。

^⑬ 參見林慶彰編：〈姚際恆研究文獻目錄〉，收入《姚際恆研究論集》，下冊，頁1257-83。

至於嘉慶以後，可見的姚氏傳記資料，也僅有嘉慶五年（1800）吳顥所編的《國朝杭郡詩輯》和吳振棫重編的《國朝杭郡詩輯》二書而已。吳顥所錄姚氏傳記僅一行：

姚際恆，字立方，號首源，錢塘國子生，著有《九經通論》一百六十三卷。^⑭

這一行之後有姚氏〈宣和寶硯歌〉一首。吳振棫重編後，傳記資料大大增加：

姚際恆，字立方，號首源，錢唐監生（《府志》·仁和諸生）。首源博究群書，撐腸萬卷。毛西河嘗作〈何氏存心堂藏書序〉，以示其兄大千。大千曰：「何氏書有幾，不過如姚立方腹篋已耳。」其為一時推服如此。既而盡棄詞章之學，專精治經。年五十曰：「向平婚嫁畢而遊五嶽，予嫁畢而治九經。」遂屏人事，閱十四年而書成，名曰《九經通論》，凡一百六十卷。又著《庸言錄》若干卷，雜論經史、理學、諸子。末附《古今偽書考》，持論極嚴覈。其家構海峰閣，西窗面湖，簷際懸舊薰霽紅椀，夕陽映射，一室皆作霞光。有〈西窗絕句〉云：「高閣虛明木榻施，晝間兀坐每移時，湖山一角當窗面，烟樹殘霞晚更宜。」《府志》入〈儒林傳〉。^⑮

傳記資料之後，錄有〈宣和寶硯歌〉、〈家藏東坡笠屐圖貌似毛西河戲贈一絕〉等二首詩，比吳顥本要多出一首。

雖然，清嘉慶年間以後，姚氏的著作，如《古今偽書考》、《好古堂家藏書畫記》、《續收書畫奇物記》、《詩經通論》等四書已有刻本，但並沒有廣泛的流傳。所以民國初年，顧頡剛作《清人著述考》時，才沒有將姚氏的著作列入。至於載有姚氏傳記資料的《（乾隆）杭州府志》、《國朝杭郡詩輯》，

⑭ 見吳顥輯：《國朝杭郡詩輯》（清嘉慶五年守惇堂刊本），卷4，頁22。

⑮ 見吳顥輯，吳振棫重編：《國朝杭郡詩輯》（清同治十三年錢塘丁氏重刊本），卷7，頁15上-16上。

都不是流傳很廣的書，學者一時也不知有姚氏的資料在內。姚氏這人的事蹟如何，最重要著作《九經通論》存佚情形，才需要胡適、顧頡剛師生兩人合力來蒐輯，並花費顧氏一生的時間來點校整理。

三、蒐集整理姚際恆的著作

顧頡剛是怎麼知道姚際恆的著作的？他最先注意到的姚氏著作是那一本？以後如何來蒐集整理姚氏的著作，這是研究兩人學術關係時，最先要討論的。

顧氏最先注意到的姚氏著作，是《古今僞書考》。這部書他早在《書目答問》中見到，因該書收入《知不足齋叢書》裏，而該叢書又不容易見到，所以顧氏並未讀過該書^⑩。

宣統元年（1909），顧頡剛十七歲，向孫宗弼借到了浙江書局刊本的《古今僞書考》，讀過之後，顧氏自認為「在頭腦裏忽然起了一次大革命」，顧氏又說：

我在二十歲以前，所受的學術上的洪大震盪只有兩次。第一次是讀了一部監本《書經》，又讀了一篇《先正事略》中的〈閻若璩傳〉。第二次，就是這一回，翻看了一部《漢魏叢書》，又讀了一本《古今僞書考》。我深信這兩次給與我的刺戟深深地注定了我的畢生的治學的命運，我再也離不開他們的道路了。^⑪

當然影響顧氏治學的方向的，不止姚際恆一位而已，鄭樵、崔述等人都曾影響過顧氏。但在這些古人中，顧氏最早接觸到的應該是姚際恆。

由於《古今僞書考》給顧氏的震撼，民國三年（1914）顧氏乃向孫宗弼借

^⑩ 參顧頡剛撰：〈校點古今僞書考序〉。

^⑪ 同前註。

該書來鈔錄，並校正書中的訛誤，鈔畢，並作了一篇〈古今僞書考跋〉。該跋說：

右《古今僞書考》一卷。宣統己酉歲，始見於孫伯南先生架上。去年在京中刻意求之不能得，遂借自孫先生手錄焉。是書始刊於《知不足齋叢書》；先生所藏為光緒十八年秋浙江書局單行本。浙局是刻，板本甚劣，譌謬為繁。今就其可正者正之；他日得善本，當重校。^⑱

可見顧氏對所見的這一版本並不滿意，有重校的計畫。

顧頡剛本來也祇是受姚氏《古今僞書考》之影響而已，並不知姚氏還有其他的著作。顧氏所以會較全面性蒐集姚際恆的著作，是受胡適的影響。民國九年（1920）十一月，胡適寫信給顧頡剛，詢問姚際恆之著述，以為姚氏能作《九經通論》，是一很大膽的人，顧氏所作《清人著述考》，不應沒有姚際恆。十一月二十三日，顧氏就查詢結果，向胡適寫信報告。次日，胡適回信，勸顧氏點讀《古今僞書考》，可協助出版。同日，顧氏給胡適回信，以為「點讀《僞書考》，這件事很容易，大概至慢也不過二十天。」回函另附民國三年（1914）所作的〈古今僞書考跋〉。顧氏隨即開始標點《古今僞書考》。由於想將姚氏所徵引的書都注明卷帙、版本，徵引的人都注明生卒、地域，碰到很多困難，最後放棄加注^⑲。

同年，十二月十五日顧頡剛寫信給胡適，想將《諸子辨》、《四部正譌》、《古今僞書考》編為一冊，書名叫《辨僞三種》。並想為這一冊書作跋，內有五個表，分別是：僞書所記的時代、造僞書的時代、宣揚僞書的人、辨僞書的人、根據了僞書所造成的歷史事實。十八日，胡適的答書認為所列五項皆不適合作表，但第五項尤為重要，應佔全跋之大半。民國十年（1921）一

^⑱ 見顧頡剛編：《古史辨》（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0年3月重印本），第1冊，頁7。

^⑲ 同前註，顧氏〈序〉。

月，顧頡剛校點《古今偽書考》完畢，與《諸子辨》、《四部正譌》等，編入《辨偽叢刊》第一集，並作跋文。民國十八年（1929），十一至十二月，顧氏開始校對《古今偽書考》，十九年（1930）二月二十三日，為校點本《古今偽書考》作序。不久，《古今偽書考》由樸社出版，為《辨偽叢刊》之一。這是十多年來，顧氏蒐集整理姚氏著作的第一本成果。

其次，敘述蒐集整理《詩經通論》的經過。民國十一年（1922）十二月，顧氏向吳虞借到姚氏的《詩經通論》，在蘇州請人鈔錄。顧氏說，胡適索此書「於藏書最富之北平，久而不獲。其後新繁吳又陵先生北上，行篋中攜有王刻本，適之、玄同兩先生歡躍相告，予乃得假歸讀之。當時曾鈔一本，施以標點，欲重刊之而未能也。」^{②0}顧氏將《詩經通論》加標點的時間是民國十二年（1923）的三月至八月間^{②1}。民國三十三年（1944）重慶北泉圖書館長楊家駱輯印《北泉圖書館叢書》，擬將姚氏《詩經通論》列入第一集。因顧氏與楊家駱有深交，楊氏要求顧氏為《詩經通論》作〈序〉。該〈序〉於八月三十一日完成，民國三十四年（1945）四月，該〈序〉刊於《文史雜誌》第五卷三、四期合刊本中。一九五七年，顧氏在青島時，對姚氏的《詩經通論》作了相當詳細的閱讀，所作筆記都收在《湯山小記》中。次年（1958）十二月，顧氏標點的《詩經通論》，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。書中並沒有顧氏的〈序〉，也沒有交待何以遲到十餘年後才出版。這是顧氏蒐集整理姚氏著作的第二本成果。

其三，是《禮記通論》一書。民國九年（1920）十二月二十三日，胡適寫信給顧氏，說馬夷初（馬衡）提到杭世駿《續禮記集說》中引有許多姚際恆的話。希望顧氏能查一查。民國十年（1921）七月一日，胡適來信告知：「姚際

^{②0} 見顧頡剛撰：〈詩經通論序〉，《文史雜誌》第5卷第3、4期合刊（1945年4月），頁89-90。收入林慶彰、蔣秋華合編：《姚際恆研究論集》，中冊，頁371-374。

^{②1} 見顧頡剛撰：〈二次開頭〉。轉引自顧潮編：《顧頡剛年譜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3年3月），頁81。

恆的《禮記通論》，已由錢玄同先生動手從《續禮記集說》裏輯出。」^{②②}錢氏的輯稿，後來並不知下落。另外，在民國二十年代，顧氏也有輯本，後來也不知下落。一九七八年顧氏為編輯《姚際恆遺書彙輯》又作第二次輯錄，但僅將〈曲禮篇〉作初步校理，輯佚的工作並沒有完成。後來，這書的輯佚工作，由王尹珍、張維明於一九八四年完成^{②③}。至今尚未見出版。

其四，是《儀禮通論》一書。民國二十一年（1932）一月顧氏赴杭州省親，因淞滬抗戰，交通受阻，到五月一直停留在杭州。四、五月間在已故藏書家崔永安家中發現姚氏《儀禮通論》鈔本一部，「大以為快，即向其借出鈔之」^{②④}，並花費兩星期之工夫加以校對。這一鈔本，後來因為戰爭，並不知下落。一九七九年十月十日顧氏翻閱何定生《定生論學集——詩經與孔學研究》一書時，還誤以為當時所鈔之《儀禮通論》在臺灣^{②⑤}。此一鈔本在一九八〇年顧氏逝世前一直未知下落。一九九五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陳祖武先生，才在該所圖書館書架上發現^{②⑥}。

其五，是《春秋通論》。民國十八年（1929），倫明從北平某書肆購得姚氏《春秋通論》鈔本。但已缺卷十一至卷十三。顧氏在〈詩經通論序〉提到此事。今傳各種《春秋通論》的抄本，皆根據倫明所藏鈔本傳鈔。

其六，是《好古堂書目》。民國十二年（1923）秋，顧氏委託南京江蘇省立圖書館將所藏姚氏《好古堂書目》鈔本，代為鈔出一份。

②② 見胡適撰：〈論辨偽叢刊體例書〉，收入《古史辨》，第1冊，頁38-39。

②③ 參王尹珍、張維明撰：〈姚際恆《禮記通論》校點說明〉，《經學研究論叢》第四輯（1997年4月），頁181-186。

②④ 見顧頡剛撰：《日記》，1932年5月1日。轉引自顧潮著：《顧頡剛年譜》，頁201。

②⑤ 見顧頡剛撰：《日記》，1979年10月10日。轉引自顧潮著：《顧頡剛年譜》，頁398。

②⑥ 參陳祖武撰：〈姚際恆《儀禮通論》未佚〉，《經學研究論叢》第四輯，頁177-180。除中國社會科學院所藏鈔本外，北京圖書館也藏有另一鈔本，是根據顧氏鈔本傳鈔，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86-87冊中。

從以上之敘述可知，顧氏所能收集的姚氏著作，也僅有《古今偽書考》、《詩經通論》、《禮記通論》、《儀禮通論》、《春秋通論》、《好古堂書目》等六種而已。其中《禮記通論》未輯成，《儀禮通論》的鈔本後來下落不明。

四、對姚氏考辨偽書的評價

姚際恆的《古今偽書考》，主要在考辨四部偽書；其《九經通論》中的《易傳通論》、《古文尚書通論》、《周禮通論》等，也在辨偽經。說姚氏的學問是一種辨偽學，也不為過。

顧頡剛在宣統元年（1909）十七歲時，即向孫宗弼借讀《古今偽書考》，深受影響，民國三年（1914），顧氏二十二歲，又向孫宗弼借鈔《古今偽書考》，並作了一篇〈古今偽書考跋〉。民國十九年（1930），顧氏三十八歲，為校點本《古今偽書考》作序。次年發表於《史學年報》第一卷第二期中。一九五五年，顧氏六十三歲，所編《古籍考辨叢刊》第一集，收有顧氏點校的《古今偽書考》，書前的序，是從民國十九年的序稍作修改而成。

至於姚氏《九經通論》中專辨偽經的《易傳通論》、《古文尚書通論》、《周禮通論》數書，因早已亡佚，顧氏也無法作評論。所以，要得知顧氏對姚際恆考辨偽書的評價，祇能根據〈古今偽書考跋〉和〈校點古今偽書考序〉兩文。

（一）對偽書分類的質疑

姚氏《古今偽書考》將偽書按經、史、子分為三類。接著又按偽書的性質分為有真書雜以偽者；有本非偽書而後人妄托其人之名者；有兩人共此一書名，今傳者不知為何人作者；有書非偽而書名偽者；有未足定其著書之人者等類。顧氏在〈古今偽書考跋〉中，對書中的分類提出質疑的有十數種，如：

1. 將《忠經》入經類，《天祿閣外史》入史類，「得毋但觀其名歟」？
2. 《詩序》既根據《後漢書》證為衛宏所作，卻又云「非偽書而實亦同於偽書也」。
3. 《乾鑿度》既云「宋人掇拾類書而成」；《竹書紀年》既云「予於《紀年》，以為後人增改」；《李衛公問對》，明云「今世傳者當時神宗時所定，而彼所定實採《通典》」。既如此，三書都是「真書雜以偽」，為何將之與偽書同列？
4. 《商子》一書，姚氏曰：「其精確切要處，《史記》列傳包括已盡，凡《史記》所不載，往往為書者所附會」；論《賈誼新書》云：「多錄《漢書》語，其非《漢書》所有者，輒淺較不足觀，決非誼本書也。」這兩段話的說法相同，姚氏卻將《商子》斷為「偽」，而《新書》為真，實「不足以服人」。
5. 論《脈訣》云：「稱晉王叔和撰，晁氏謂後人依託」，論《金匱玉函經》云：「此非仲景撰，乃後人依託者」。說法相同，卻以《脈訣》為偽，《金匱玉函經》為真，也「不足以服人」。
6. 《孫子》一書，反覆無證驗，實應與《鬻子》、《鬼谷》並在偽書，而獨入「未定其人」，豈為當乎！

以上是顧氏所舉《古今偽書考》缺點的一部分，從這些例子，可約略看出姚氏作判斷時考慮實有欠周詳的地方。

(二)指出姚氏所列偽書之缺漏

姚際恆《古今偽書考》中所列之偽書有九十種，實則，自古以來之偽書實不止此數。顧頡剛在《古今偽書考跋》中曾指出其缺漏說：

其缺而未舉者，在「經」，有《書序》、《周易舉正》、《乾元序制記》、《論語筆解》、《六經奧論》諸書。在「史」，有《聖賢群輔

錄》、《五孝傳》、《卓異記》諸書。在「子」，有《孟子外書》、《鄧析子》、《燕丹子》、《靈棋經》、《道德指歸論》、《老子河上公注》、《莊子郭注》、《群書治要》、《家山圖書》、《搜神記》、《述異記》諸書。至於醫藥術數之籍，不可勝計。若「真書雜偽」，則有朱子《通鑑綱目》；「兩者併名」，則有高誘《戰國策注》；在姚氏成書後，則有日本刻《古文孝經孔傳》、《今文孝經鄭氏注》。如此諸類，並可補論，勿求備於此書已。

顧氏計舉出經部五種；史部三種；子部十一種。此外，「醫藥術數之籍，不可勝計」。當然，顧氏並沒有要將姚氏所未錄的偽書全部舉出來的意思。所以才舉出十餘種而已。民國二十八年（1939），張心澂編的《偽書通考》，所收偽書達一〇五九種。如從求全責備的觀點來看，姚氏的《古今偽書考》，當然不完備。

（三）指出姚氏辨偽方法的缺失

自明代宋濂的《諸子辨》、胡應麟的《四部正譌》，辨偽已有自己的專書。胡應麟更在《四部正譌》書末附有辨偽書的方法。胡氏說：「凡覈偽書之道：覈之《七略》以觀其源；覈之群志以觀其緒；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；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；覈之文以觀其體；覈之事以觀其時；覈之撰者以觀其託；覈之傳者以觀其人。覈茲八者，而古今贗籍亡隱情矣。」^{②⑦}姚際恆的《古今偽書考》，因僅是姚氏讀書時的筆記，內容並不完備，也不像胡應麟，舉出辨偽之方法。但從《古今偽書考》中，仍可看出辨偽所採用之方法。顧頡剛對姚氏的辨偽方法批評說：

^{②⑦} 胡應麟撰：《四部正譌》，頁47。收入《偽書考五種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79年10月第3版）。

蓋嘗論之，其病有二。一則以文辭之工拙定真偽，故《文》、《列》為真而《鶡冠》、《公孫龍》為偽。二則以後世著述之成法鑿括古籍，故《黃帝素問》、《神農本草》、《晏子春秋》胥入偽書。姚君抑亦未深思乎？²⁸

顧氏在這段話中，提出辨偽方法的兩大問題，一是以書之文體來論斷真偽，是否準確？顧氏舉《文子》和《列子》二書，《文子》的文體，根據柳宗元的說法，「渾而類者少」；《列子》的文體，姚氏以為「明媚近人，氣脈降矣」，但姚氏都將二書列入「有真書雜以偽者」這一類；而《公孫龍子》的文體，根據陳振孫的看法，是「淺陋迂僻」；《鶡冠子》的文體，根據柳宗元，是「盡淺陋言也」。因此，姚氏將兩書都列為偽書。同樣從文體來考量，有些是真書雜以偽，有些則是全偽。顧氏對姚氏這種辨偽的方法，頗有意見。二是以後世著述之法來看古籍，而判斷真偽，是否正確？在顧頡剛的觀念裏，古書有很多並非一人一時所作，可能是同一學派的人的集體創作，後人再為之冠上某一古人之名。因為後人的誤解，常常將這種古書認為是偽書。顧氏認為《黃帝素問》、《神農本草》、《晏子春秋》都是屬於這一類的著作，姚氏全部把它當作偽書，恐有不當。

(四)肯定《古今偽書考》的價值

顧頡剛曾說《古今偽書考》一書，影響了他畢生治學的命運。《古今偽書考》的真正價值如何，顧氏在〈校點古今偽書考序〉也有說明：

《古今偽書考》只是姚際恆的一冊筆記，並不曾有詳博的敘述，它的本身在學術上的價值可以說是很低微的。但他敢於提出「古今偽書」一個名目，敢於把以前人不敢說的經書（《易傳》、《孝經》、《爾雅》

²⁸ 見顧頡剛撰：〈古今偽書考跋〉。

等)一起放在偽書裏,使得初學者對著一大堆材料茫無別擇,最易陷於輕信的時候,驟然受一個猛烈的打擊,覺得故紙堆裏有無數記載不是真話,又有無數問題未經解決,則這本書實在具有發聾振聵的功效。所以這本書的價值,不在它的本身的研究成績,而在它所給予學術界的影響。

根據顧氏的說法,《古今偽書考》因僅是一本短小的讀書筆記,所以本身的學術價值並不高。重要的是該書疑古辨偽的觀念,對後代學術界所造成的影響。就這一點來說,顧氏的評價是相當正確的。在姚氏之前的辨偽專著中,宋濂的《諸子辨》,僅辨子部之書;胡應麟的《四部正譌》僅辨史、子、集之書,將堂堂聖人所傳的經書,一部部辨其真偽,這是前所未有的。更甚者,姚氏也告訴後人,經書中其實是有很多問題的,並非句句皆真,也不一定全來自聖人。這啓導了後代學者對古代典籍的重新檢視,民國以來的國故整理運動、古史辨運動,其實都從姚氏這裏得到養分。

五、對姚氏詮釋《詩經》的評價

顧頡剛除對姚氏的《古今偽書考》有研究外,對《詩經通論》也有不少批評。這些批評,都見於《顧頡剛讀書筆記》第七卷(上)《湯山小記》的(六)、(七)之中。《湯山小記》是一九五七年顧氏讀《詩經通論》的筆記。顧氏對姚氏《詩經通論》的種種看法,都可從這些筆記中看出來。茲分項敘述如下:

(一)批評姚氏反《詩序》不夠徹底

《詩序》相傳為子夏所作。子夏為孔子得意的弟子之一。既如此,《詩序》可說傳自孔門。歷來也因此把《詩經》和《詩序》視為一體。姚氏以為《詩序》首句(姚氏稱為「小序」)是謝曼卿所作,申述語(姚氏稱為「大序」)為衛宏所作。《詩序》既僅是漢人之作,必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,姚氏不但批評《詩

序》，對朱子《詩集傳》有違從《詩序》的地方，也大加批評。甚至認為《詩集傳》可廢。照姚氏的態度來看，應該是反序最力的人，但是他反《詩序》也有不夠徹底的地方，這點顧頡剛頗有批評，如〈周南·關雎〉一詩，《詩序》云：「后妃之德也。〔……〕樂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憂在進賢，不淫其色。哀窈窕，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焉。」姚氏並不贊同《詩序》之說法，另立詩旨說：

此詩只是當時詩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，以見嘉耦之合初非偶然，為周家發祥之兆，自此可以正邦國，風天下。^{②⑨}

由「后妃之德」改成「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」，在顧氏這種反《詩序》的人來看，仍舊在《詩序》的思考模式中打轉。所以顧氏要批評說：「仍落《詩序》圈套，亦見其獨立思考之不徹底也。」^{③⑩}

對於姚氏批評《詩序》，顧氏大多持肯定的態度。如〈周南·桃夭〉一詩，《詩序》云：「后妃之所致也，不妬忌，則男女以正，昏姻以時，國無鰥民也。」姚氏對《詩序》的說法深不以為然，反駁說：

〈小序〉（按：即首句）謂「后妃之所致」。每篇必屬后妃，竟成習套。夫堯、舜之世尚有四凶，太妣之世亦安能使女子盡賢，凡于歸者皆宜室、宜家乎！即使非后妃之世，其時男女又豈盡踰垣、鑽隙乎！《大序》（按：即申述語）復謂「不妒忌則男女以正，昏姻以時，國無鰥民」。按孟子言「大王好色，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」，此蓋諷諫之言，然於理猶近。若后妃不妒忌于宮中，與「國無鰥民」何涉，豈不可笑之

②⑨ 見姚際恆撰：《詩經通論》，卷1，頁19。收入《姚際恆著作集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1994年6月），第1冊。

③⑩ 見顧頡剛撰：《顧頡剛讀書筆記》第七卷上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0年1月），《湯山小記(七)》，頁4939。

甚哉！^⑳

姚氏對《詩序》之駁斥，顧氏贊賞說：「此駁極明快。」^㉑當然，姚氏對《詩序》的批駁也並非顧氏所舉的一兩條而已。顧氏所以舉這一條祇不過要贊賞其批駁有理而已。

(二)稱許姚氏治經無宗派之見

治經素有漢學、宋學之別，如就《詩經》來說，漢學的代表是毛《傳》、鄭《箋》，宋學之代表是朱子的《詩集傳》。一般學者治經，不入漢學，即入宋學。姚氏治經不受漢、宋學的拘囿，純從經文之涵泳，來判斷是非。如朱子將《詩經》中之情詩三十首皆判為淫詩。姚氏對朱子所定的淫詩大都持反對態度。但朱子並未定為淫詩的〈鄭風·將仲子〉，姚氏涵泳經文的結果，斷以為淫詩，他說：

〈小序〉（按：即首句）謂「刺莊公」。予謂就詩論詩，以意逆志，無論其為鄭事也，淫詩也，其合者吾從之而已。今按此詩言鄭事多不合，以為淫詩則合，吾安能不從之，而故為強解以不合此詩之旨耶！^㉒

這是姚氏涵泳詩篇本文所作的判斷。顧氏對姚氏的判斷非常的贊賞，說：「（姚氏）雖常駁朱熹淫詩之說，而獨於此從其說，知其明大是大非，不以宗派自局限也。」除了這首〈鄭風·將仲子〉之外，姚氏也指出〈召南〉之〈野有死麕〉，〈邶風〉之〈靜女〉，〈鄘風〉之〈桑中〉，〈齊風〉之〈東方之日〉，皆「鄰于淫者」。顧氏對姚氏的說法，再一次的贊許說：「姚氏涵泳經文，屏除漢、宋宗派之成見，惟是是歸，可謂超絕古今者矣。」^㉓

⑳ 見姚際恆撰：《詩經通論》，卷1，頁31。

㉑ 見顧頡剛撰：《顧頡剛讀書筆記》第七卷上，頁4934。

㉒ 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卷5，頁145。

㉓ 顧頡剛撰：《顧頡剛讀書筆記》第七卷上，頁4946。

(三)稱許姚氏能引他經解《詩》

經書的詮解，或以本書爲證，或以他經互證，或以史、子、集爲證。姚氏博極群書，又作《九經通論》，故能引他經來印證《詩經》中的字義。這點頗受顧頡剛肯定。如〈召南·標有梅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說：「男女及時也。召南之國，被文王之化。男女得以及時也。」姚氏並不滿意這種說法，另立詩旨說：

愚意，此篇乃卿、大夫爲君求庶士之詩。《書·大誥》曰：「肆予告我友邦君，越尹氏、庶士、御事。」〈酒誥〉曰：「厥誥毖庶邦、庶士。」〈立政〉曰：「庶常吉士。」是「庶士」爲周家衆職之通稱，則庶士者乃國家之所宜亟求者也。³⁵

對於姚氏的新說，顧氏以爲：「〈標梅〉久被人說爲女求夫詩矣，姚氏以《尚書》相比，乃直指爲王朝求臣之詩，與〈小星〉篇在妾媵僞說下解放一般，極有眼力。」³⁶顧氏更認爲姚氏因能以《詩》、《書》字句相較，故多創見。

又如〈衛風·淇奧〉的「寬兮綽兮」，姚氏也引《尚書·無逸》的「不寬綽厥心」，表示古代的「寬」、「綽」是善字。〈鄘風〉的「牆有茨」的「茨」，即《書·梓材》「既勤垣墉，其塗墜茨」之「茨」。茨，所以覆牆。言牆上有茨，本不可埽，以比中冓之言本不可道。顧氏認爲姚氏能將《詩》、《書》比勘，「真義即見」。就這一點來說，因《詩》、《書》的作成時代相近，用詞也有不少相同，能將兩書用詞相比較，自可解決不少疑難。但這也惟有像姚氏精通《詩》、《書》者才能做得到。

³⁵ 見姚際恆撰：《詩經通論》，卷2，頁58。

³⁶ 見顧頡剛撰：《顧頡剛讀書筆記》第七卷上，頁4936。

(四)稱許姚氏通名物之學

《詩經》作成於西周至東周初年，詩篇內提到不少名物，要了解詩篇的字句，就得先了解字句中名物的意涵。由於許多名物都已亡佚，除非從地下出土，否則很難知道該名物的真正面貌。這也是宋初聶崇義作《三禮圖》，所繪之圖多與實物不太相合的原因。歷來研究《詩經》，能以實物為證的並不多。姚際恆除嗜書之外，也有不少書畫、古物的收藏，這祇要檢閱姚氏的《好古堂書畫記》，即可得到印證。也因為關心古器物，把這方面的知識應用到經書的研究，也有新的見解。

顧氏對姚際恆這種以古物與經書互證的方法也頗為欣賞，如〈鄘風·君子偕老〉：「副笄六珈」，鄭玄〈箋〉云：「珈，古之制所有，未聞。」姚際恆則補充說：

加于笄上，故名珈。猶今之釵頭。以滿玉為之；狀如小菱，兩角向下；廣五分，高三分。予家有數枚。漢時，三代玉物多殉土中，未出人間，故鄭未見。鄙儒以鄭去古未遠，謂其言多可信，于此乃知真瞽說也。^{③7}

因為姚氏家有收藏珈三枚，所以能說出其形制和用途。這點自是鄭玄所不及。顧氏說：「鄭玄去古雖近，而古器物學尚未發達，其不識宜也。至宋而古器物學興，至姚氏而家多收藏，其智識富于鄭氏自是當然。」^{③8}

另外，〈小雅·斯干〉：「載弄之璋」、「載弄之瓦」，《毛傳》云：「半珪曰璋」、「瓦，紡塼也」，姚氏補充說明：

今世傳有三代玉璋，長一、二寸，至長不過三寸；其制不一；有孔可穿絲繩，故初生子可弄。瓦，《毛傳》以紡塼解之；不可以塼為瓦。

^{③7} 見姚際恆撰：《詩經通論》，卷4，頁102。

^{③8} 見顧頡剛撰：《顧頡剛讀書筆記》第七卷上，頁4941。

[……]予又見三代古玉，長、闊寸許，如瓦形，或即是此。^{③⑨}

姚氏以爲璋是一、二寸至三寸長的玉璋。瓦可能是長、闊寸許的瓦形玉。顧氏對姚氏的補充解釋稱許說：「此可見其對於古器頗用心，故能用實物證經典，其人蓋程瑤田、吳大澂之流亞。」^{④⑩}

六、姚氏對顧頡剛的影響

顧頡剛從宣統元年（1909）他十七歲時開始讀姚氏的《古今僞書考》，直到一九七八年顧氏八十六歲時，仍在努力編輯《姚際恆遺書彙輯》。這七十年間研究姚際恆的成果並沒有很多。但顧氏所受到姚際恆的影響是巨大的。這點前文已略有談到。茲爲更有系統的論述，再分以下數點討論：(1)啓導疑古辨僞的精神；(2)啓發孟姜女故事的研究；(3)啓導《詩經》研究的新學風。

(一)啓導疑古辨僞的精神

這是顧頡剛所受姚氏影響中最重要的一點，顧頡剛在〈我是怎樣編寫《古史辨》的？〉一文中談到他十四歲左右，躺在床上看王謨所編的《漢魏叢書》，很得意把漢、魏、六朝的書都看完了，對那一時期的學術和政治也有了理解，後來看了姚際恆的《古今僞書考》，顧氏有什麼樣的感受呢？他說：

他竟判定這些書差不多十有八、九都是假的，這就在我的腦筋裏起了一回大震盪，才明白自己原來讀的，其實並不都出於漢、魏、六朝時期人的手筆，其中有不少乃是宋、明時人的贗作。^{④①}

這是告訴顧氏前人的著作中有不少是僞書，並不是每本都可相信。此外，《古今僞書考》中列有經部的著作數十種，如《易傳》、《古文尙書》、《詩

^{③⑨} 見姚際恆撰：《詩經通論》，卷10，頁292。

^{④⑩} 見顧頡剛撰：《顧頡剛讀書筆記》第七卷上，頁4958。

^{④①} 見顧頡剛撰：〈我是怎樣編寫《古史辨》的？〉。

序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孝經》、《爾雅》等，本來都是神聖的經典，怎麼都變成偽書？又姚氏把《易傳》、《古文尚書》、《周禮》也都列入別偽類，且各有專著。這更啓導了顧氏，所謂經書並沒有那麼神聖，其中有不少是後人偽造的，即使是真經書，所記載的史事也不一定可信。

顧氏在姚氏的影響下，在民國十年（1921）給錢玄同的〈論孔子刪述六經說及戰國著作偽書書〉^{④2}中，已否定孔子刪述六經，並提出戰國人不但隨便編造偽事，而且已在著作偽書。以舜為例，說明「《尚書》上的《堯典》已是偽造，《孟子》上的引文更是因《堯典》去踵事增華所致」。這已認為古史是慢慢累積起來的。民國十二年（1923）四月，顧頡剛在〈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〉^{④3}中，即提到要寫一篇〈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〉，並以舜為例，說明古史層累的情形。這就是驚動當時學術界的「古史層累說」。要探尋顧氏這種新學說的淵源，不能不注意姚際恆這邊的線索。

（二）啟發孟姜女故事的研究

顧頡剛不但研究古代史，也研究與古史有密切關係的民間故事。研究孟姜女更是受到鄭樵和姚際恆兩人的影響。民國十年（1921）冬天，顧氏開始輯集鄭樵的《詩辨妄》，順便輯鄭氏的詩論，在《通志·樂略》中見鄭氏論《琴操》的一段話：

《琴操》所言者何嘗有是事！〔……〕君子之所取者，但取其聲而已。
〔……〕又如稗官之流，其理只在唇舌間，而其事亦有記載。虞舜之父，杞梁之妻，於經傳所言者不過數十言耳，彼則演成萬千言。^{④4}

④2 見顧頡剛編：《古史辨》（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0年3月重印本），第1冊，頁41-43。

④3 見顧頡剛編：《古史辨》，第1冊，頁59-66。

④4 見鄭樵撰：《通志二十略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年11月），〈樂略〉第1，頁910-911。

顧氏受「初未嘗有是事，而為稗官之流所演成」這一觀念的影響，才知道像孟姜女故事裏可能有一段複雜的因緣。但顧氏承認這個影響並不太大。民國十二（1923）年春天，顧氏讀姚氏《詩經通論》，在〈鄭風·有女同車〉下，姚氏說：

《序》〔……〕謂「孟姜」為文姜。文姜淫亂殺夫，幾亡魯國，何以贊其「德音不忘」乎！〔……〕詩人之辭有相同者，如〈采唐〉曰「美孟姜矣」，豈亦文姜乎！是必當時齊國有長女美而賢，故詩人多以「孟姜」稱之耳。^{④⑤}

因為這段話讓顧頡剛想起了孟姜女，知道在未有杞梁妻的故事時，孟姜已是美女的通名。顧氏認為這是他注意孟姜女故事的第二回。以後，顧氏有意、無意的發現了許多孟姜女故事的材料，並研究該故事的演化程序，及在各代的演變。激起了研究孟姜女的熱潮。後來，顧氏把這些相關論文編成《孟姜女故事研究集》三冊^{④⑥}。是民國初年研究民間文學的重要成果之一。

（三）啟導《詩經》研究的新學風

《詩經》除了詩篇本文之外，又有所謂《詩序》。《詩序》是現存最早、最有系統解釋《詩經》各篇詩旨的文字。自漢代起《詩經》的解釋即受其影響。當時人以爲《詩序》是子夏所作。子夏是聖人之門人，所以，《詩序》也有聖人教化的理想在內。《詩序》的權威在宋朝初年起開始受到挑戰，到南宋初鄭樵作《詩辨妄》、朱熹作《詩集傳》，已廢去《詩序》。清初的姚際恆在解釋《詩經》時，不但反漢學的毛、鄭，更反宋學的朱子，對於《詩序》，他以爲〈小序〉（按：即首句）是謝曼卿作，〈大序〉（即：申述語）是衛宏作。既

^{④⑤} 見姚際恆撰：《詩經通論》，卷5，頁152。

^{④⑥} 這套書原由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，於1928-29年間出版。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重印本。

是漢人之所作，就不必相信它。所以主張去《序》言詩。姚際恆有關《詩序》的觀點在民國初年開始發酵，幾乎大部分的學者都以爲《詩序》是衛宏所作^{④⑦}。顧頡剛當然也以《詩序》爲衛宏所作。這雖是民初學者論《詩序》的共識，但追根溯源的話，必與姚際恆有關。

此外，在研讀《詩經》的方法上，漢唐之學由於受《詩序》的解釋觀點的左右，釋詩也極盡附會之能事。宋人廢去《詩序》，解釋時所能依傍的前人之言也減到最少。要體會詩意，就要從「深玩辭氣，而得詩人之本意」^{④⑧}入手。姚際恆既不信《詩序》，他讀《詩經》的方法也和朱子相近。所以，他說：

惟是涵泳篇章，尋繹文義，辨別前說，而黜其非，庶使詩意不致大歧，埋没于若固、若妄、若鑿之中。^{④⑨}

這就是經典研究中的「回歸原典」。民國初年的《詩經》研究，在反《詩序》之外，純從詩篇的本文來釋詩的相當多，如民國十一年（1922），郭沫若有《卷耳集》，譯詩四十首，詩旨的認定，即出於郭氏涵泳本文後的體會。民國十四年（1925）胡適在《晨報·藝林旬刊》發表〈談談詩經〉，對〈國風〉中的很多詩篇，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，民國二十年（1931）六月，在《青年界》發表〈周南新解〉，更是有意重新解釋詩篇詩旨的開端。如就顧頡剛來說，他在民國十四年（1925）二月所發表的〈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〉^{⑤⑩}，當然也是就本文所涵泳的結果。這種尋繹本文以求詩旨的研究法，自與朱子、姚際恆的方法相通。但以民國初年的學術風氣來觀察，自是受姚際恆的影響較多。

④⑦ 參林慶彰撰：〈民國初年的反詩序運動〉，收入中國詩經學會編：《第三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香港：天馬圖書公司，1988年6月），頁260-282。

④⑧ 見王懋竑撰，何忠禮點校：《朱熹年譜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10月），卷4，頁279。

④⑨ 見姚際恆撰：《詩經通論·自序》，頁16。

⑤⑩ 該文原發表於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》第1卷第10-12期（1925年12月16日-30日）。後收入《古史辨》，第3冊，頁608-658。

七、結 論

茲將以上數節的論述略作歸納：

其一，姚際恆雖作有《古今偽書考》、《九經通論》等，但他的事蹟和著作，可說湮沒不彰。在清初僅閻若璩、毛奇齡的著作略有提到而已。乾隆時代編《四庫全書》，姚氏著作全未收錄。姚氏《九經通論》也僅杭世駿《續禮記集說》有引用而已。嘉慶以後，先有鮑廷博將姚氏《古今偽書考》收入所刻《知不足齋叢書》中。至清末另有七種不同板本。顧修輯刻的《讀畫齋叢書》，也收有姚氏的《好古堂家藏書畫記》、《續收書畫奇物記》。王篤的鐵琴山館也刊刻了《詩經通論》。雖然，嘉慶以後姚氏的著作多種已有刊本，但流傳仍不廣，知道他事蹟的人也不多。所以，顧頡剛編《清代著述考》才沒有收錄姚際恆的著作。

其二，顧頡剛在宣統元年（1909）十七歲時，讀到姚際恆的《古今偽書考》自稱「在頭腦裏忽然起了一次大革命」，也影響了他一生治學的命運。此後，開始標點《古今偽書考》，並於民國十年（1921）編入《辨偽叢刊》第一集中。民國十一年（1922）向吳虞借到《詩經通論》，次年開始加標點，但並未出版。一九五七年，顧氏在青島，詳讀《詩經通論》，讀書記錄都在顧氏的《湯山小記》中。又民國十年（1921），胡適告知顧氏，已由錢玄同從《續禮記集說》中輯出姚氏的《禮記通論》，但輯稿一直未有下落。一九七八年顧氏為編輯《姚際恆遺書彙輯》，再作輯錄，但並未完成。民國二十一年（1932），顧氏在杭州崔氏藏書樓發現《儀禮通論》，並請人鈔錄。後因戰亂不知去向。顧氏辛苦一輩子，所得之姚氏遺書也僅有《古今偽書考》、《詩經通論》、《儀禮通論》等數種而已。

其三，姚氏的《古今偽書考》，就疑古辨偽之精神來說，給顧氏很深的影響。如就實質內容來考察，顧氏也指出不少疏失，如偽書的歸類不當、所列偽

書有所缺漏、以文體來辨偽之確當性等都是。雖然如此，顧氏仍然相當肯定《古今偽書考》的價值，以為它能將以前神聖不可侵犯之經書，判定為偽書，對民初的疑古思潮，有啓發的作用。

其四，顧氏對姚氏的《詩經通論》，也作了較仔細的研究。對於姚氏反《詩序》不夠徹底，提出了批評。如就姚氏的長處來說，顧氏贊許他治經無宗派之見，不落漢、宋窠臼，唯是是從。對姚氏能以《尚書》等他經的字詞來和《詩經》相比勘，也頗為肯定。對姚氏能以古器物來勘驗《詩經》的名物，肯定姚氏是程瑤田、吳大澂之流亞。

其五，就姚氏對顧氏的影響來說，本文提出三點：一是啓導疑古辨偽的精神；二是啓發孟姜女故事的研究；三是啓導《詩經》研究的新學風。姚氏之學因顧頡剛而發揚光大，顧頡剛也因姚氏的影響，而開創了民國以來研究古史的新風氣，成為所謂「古史辨」學派的靈魂人物。

姚際恆與顧頡剛

林 慶 彰

提 要

姚際恆（1647-?）為清初最有疑古精神的經學家。顧頡剛（1893-1980）則是民國時期的疑古學大師。兩人相隔兩百多年，所以要一起討論，是因為顧頡剛的疑古精神是受到鄭樵、姚際恆、崔述等人的影響。

本論文主要在論述清代以來姚際恆的事蹟湮沒不彰，再討論顧頡剛如何蒐集整理姚際恆的著作，並探討顧氏對姚氏辨偽書和詮釋《詩經》的評價。最後，從啓導疑古辨偽的精神、啓發孟姜女故事的研究、啓導《詩經》研究的新學風等三方面來論述姚際恆對顧氏的影響。

Yao Chi-heng and Ku Chieh-kang

LIN Ching-chang

Yao Chi-heng (1647-?) was one of the classical scholars of the early Ch'ing who best exemplified the spirit of "doubting antiquity." Ku Chieh-kang (1893-1980) was a great master of critical studies of antiquity, during the time of the Republic. These two men lived more than 200 years apart from one another; nevertheless, they are discussed together in order to show that Ku Chieh-kang's suspicions of antiquity were influenced by such people as Cheng Ch'iao, Yao Chi-heng, Ts'ui Shu, and others.

This essay basically aims to discuss the accomplishments of Yao Chi-heng, under-appreciated from Ch'ing times onwards. Moreover, it discusses how Ku Chieh-kang collected and organized the works of Yao Chi-heng; it further explores Ku's appraisal of Yao's attributions of unauthentic texts and his exegeses of the Classic of Poetry. Finally, this essay discusses Yao Chi-heng's and Ku Chieh-kang's influence, by focusing on the impetus they provided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critical spirit of the tradition doubters, the stimulus they gave to research into the Meng Chiang-nü story, and their creation of a new way of research into the Classic of Poetry.

Key words: Yao Chi-heng Ku Chieh-kang